序章　古代东亚文明与日本文化

古代的东亚地区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从遥远的古代，从中国黄河流域孕育出东亚文明的先河，一直到 11 世纪中国形成稳定的封建社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东亚地区的文明经历了一个发展和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并吸收周边地区文化的运动过程。

自远古以来，中原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东亚文明逐渐形成一个发达的文化中心。华夏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已经积淀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一方面，在东亚文明的中心地区，具有不同特色的部族与区域的文化不断撞击与融合，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随着东亚文明的不断成熟，它产生越来越强大的辐射力量，加强了同这一文明中心地区周边各地文化的撞击与交流。这可以说是自古代至中世东亚地区文明变迁的概貌。

我们首先应该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在东亚文明的总框架中分析日本文化所处的地位以及它的变迁过程。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分析，才能把握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当我们依据这种方法加以探索时，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明和东亚文明显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首先，世界各地古老文明中心曾经辉煌灿烂。截至公元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世纪之前，世界各地文明区域形成了各自中心地区的文明核心，东亚文明则表现为中国大陆中原地区的文化繁荣。从世界人类文明的层面来观察，截至公元前 2 世纪之前，各个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已经趋向成熟，呈现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在世界的一些主要文明发源区域，希腊、中国和印度都已经创造出辉煌的古代文化。

这一时期的印度经过两河流域文明发源以来的长期发展，正值优波尼沙和吠陀时代，各种思辨哲学派别争相斗艳，包括怀疑派、诡辩派和虚无派等各种思想流派都形成完备体系，文学艺术也作为这一地区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呈现一片繁荣。

从欧洲文明的历史来看，这一时期的希腊已经成为古代繁荣文化的重要中心。仅在思维和哲学的领域中，这时已经涌现出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等各种流派，各自都提出了比较成熟的学说。至于古希腊时期的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雕塑和建筑成为流传后世而为人赞叹不已的历史文明证据，维纳斯神像在今天成为人们审美的理想境界的代表，雅典神殿至今仍是人们神往的巨型建筑。希腊古神话和史诗成为其后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渊源，科学技术也发展到相当水平。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源头—— 世界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于公元前 776 年在古希腊举行的。这些情况说明，截至公元前 2 世纪时，欧洲和南亚分别出现过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①]。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中国黄河下游为中心逐渐形成了高

①从世界范围来看，除去人们熟知的欧洲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东亚文明以外，古代还曾经有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很高程度的文明，但到公元前 2 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希腊、南亚以及东亚文明呈现繁荣，而其他地区的文明则因各种原因而衰落。

度发达而又成熟的东亚文明中心。人称“先秦时期”的学术活动呈现一派繁花似锦的局面。东方文明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曾经拥有“弟子三千，贤徒七十二”，建立了古代的儒学体系。同时，道家的神仙思想、墨子的“非攻”和平主义、法家主张厉行法制的社会思想，也都曾是这一时期东亚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学方面，《诗经》、《离骚》以及众多古代诗篇显示出那一时代文明的成熟。以青铜器、宫殿和文字作为标志来衡量，东亚文明在这一地区早已进入成熟的阶段。中国甘肃省东乡县出土的铜刀，经测定距今已有 5000 年。河南省偃师县发现的宫殿遗址建于 4000 余年前。甲骨文和半坡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告诉人们，它们一脉相承，早在 4000 余年前就已经为当时的人们使用。

从根本上说，渐趋成熟的农业是东亚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考古发现，黄河与长江流域发掘的许多文化遗址都有斧、刀、锄等文物出土，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众多遗址发现的窖穴房屋和墓葬都曾出土粟的皮壳，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也表明那一时代曾经存在稻谷。到公元前 2 世纪时，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已经十分发达。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水利建设的痕迹，春秋时期关于“井田制”的记载更证明农业生产的繁荣。东亚文明在中国大陆中原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从世界文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自远古以来，曾经出现过东地中海文明区、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印第安文明区和东亚文明区。这些文明区经历过古代历史上长期的变迁。根据当代研究成果，南亚次大陆地区在公元前 1500 年遭受过雅利安人的入侵，印度古代河谷文化遭到摧残。美索不达米亚据称拥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但在经历苏美尔、亚述等不同民族的冲击

之后，这一区域的文明后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埃及的金字塔标志着早期地中海地区文明的高度发达，但在马其顿征服埃及之后，其文化呈现出希腊化的趋势，后来埃及干脆被并入罗马帝国，出现命运多舛的历史。至于印第安文明，玛雅文化曾经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灿烂，但是后来却突然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之中。惟有东亚文明在中国大陆中原地区保持着长时期的繁荣，并且不断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各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

其次，古代文明区域内部存在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世界各文明区域的文化发展基本上局限于文明中心内子文化的交汇融合，同时文明中心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其文化影响。东亚文明周边的日本列岛处于东亚文明的总框架中，逐渐走向古代文明。

通观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看到，从公元前 9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正是各种文明经历地区内各地文化不断融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世界文明发展不但呈现出文明区域内的交汇融合，而且还呈现出文明区域不断扩展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交通手段的制约，各大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和撞击尚未发生。这样，文明区域内各不同地区文化的融会构成世界文明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从东亚文明的具体情况来看，先秦时期，在中国大陆中原地区及其周边，三晋、齐鲁、关中、巴蜀和荆楚以及吴越各地的文化相互撞击融合，构成华夏文化的巨大潮流，逐渐形成相当成熟稳定的古代文明。早在公元前 2700 年前后，游徙在关中、晋西南和黄河中游流域的民族部落已经逐步走向统一，其后又出现了由夏人、商人和周人建立的王朝。在这一历史时

期，中原王朝还与周边各民族交流融会，中原华夏文化也不断向四周扩展。“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和“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的记载可说是这一时期文明中心内部文化交汇的佐证[①]。

春秋战国时期是通过民族融合形成文明融会和扩展取得突飞猛进的时代。在古代，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文化载体——人来完成，不同民族和不同部族的人员流徙以及伴随武力征服造成的兼并，都曾是完成文化融会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周边地区不断融会到华夏文明的文化圈之中。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正是这种过程的具体表征。北方的燕国向北一直扩展到辽河流域。东胡逐渐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南方的楚国原来被视为“蛮夷”，经过这一时期融合，自身完全接受华夏文化，而且更向南影响到苗、彝地区。东方的东夷等也融会于齐国之中，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一支。西方的羌、氐原本是“戎狄”，但在中原文明的扩展过程中不断被吸纳至秦的范围之中，而中原文化的范围也不断向西推移。可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它逐渐向四周扩散。

在这一历史时期，东亚文明的中心地带上一直发生着文化融合，日渐形成稳定而成熟的东亚文明内核。这种文化变迁包括两个方向的运动。一方面是周边部族与民族不断接受华夏文化而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构成周边向中心的向心文化运动。他们接受先进的农耕技术，掌握农具，学习文字，甚至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人们都知道，孔丘被誉为古代东方文明的杰出思想家，曾经教育出一批中国历史上闪烁东方文明光辉的学生。其实，在他的学生中，诸如知名的“七十二贤徒”

①分别参见《册府元龟·外臣部》与《周礼·秋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就有“狄黑”和“左人郢”等原本出身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学生。“狄黑”是西方狄人出身，“左人郢”也是来自白狄。这些事实说明，周边地区不断接受华夏文化，成为创造东亚文明主要组成部分的动力。

另一方面，中心地区也不断扩大同周边地区的交流，或者吸收周边部族文化，或者向周边传输自身的文化。这既形成民族融合，也构成文化发展和融会的过程。先秦时期，赵国武灵王为适应诸侯争雄的局势，提出“胡服骑射”的口号，聘请匈奴军官训练军队，采用新式铠甲，正说明中原文化积极吸收周边文化的活力。实际上，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核心的华夏文化已经覆盖了辽阔的地域。秦时的中原文化直接涵盖的地区，东至大海及朝鲜，西至临洮与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中原华夏文化向周边扩散的过程中，受到文明中心的直接影响，朝鲜半岛也开始进入古代文明时期。这广阔的区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形成具有同样心理素质和社会规范的文化，并且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

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与日本列岛邻近的朝鲜半岛上同样也曾存在各种不同地区的文化，尤其是西北朝鲜、北部朝鲜和南部朝鲜分别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早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时，燕齐等中国北方地区已有不少移民迁徙至朝鲜西北地区。燕铸明刀钱曾在朝鲜这一地区出土，可说是那时大陆居民迁徙的一种佐证。同时，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存在大量铁制农具，也说明朝鲜半岛上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农耕文化。

第三，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特征。

从东亚文明的框架加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中原既密切联系又隔海相望的地缘条件导致日本文化

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列岛在上述古代东亚文明的环境中逐渐走向人类的文明。应该说，日本列岛的地缘环境造成日本文化独具的特色，成为培育日本文化成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日本列岛处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带，与古代东亚文明的主要部分中国大陆中原文化形成密切的交流关系。仅据中国史料记载，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日本列岛和中国中原之间已经发生频繁的交流。《山海经》中已经记载有“倭”的名称，《汉书》中也有“倭国位于乐浪海中”的记载①。至于后来的文献，更明确地记载中国中原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交流情况。《后汉书》有关于后汉光武帝赐予倭国使者印绶的记载，并且有关于倭国王师升等携生口（奴隶）160 人来献的记载。这些都充分说明，日本列岛与中国中原的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已经相当活跃。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又使它与中原的交流具有不同于华夏文化周边其他地区的特点。受到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海峡是人们活动的极大限制因素，为日本列岛的对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选择条件。海峡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可以缓解直接的冲击。在这一时期，随着华夏民族势力的增强，向周边地区不断扩展，文化融合发展很快。例如，由于华夏文化不断扩展，影响直接波及辽东以至朝鲜半岛

① 《山海经》中关于倭的记载，有所谓扶桑的说法，一直是引起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后来《梁书》中关于扶桑的说法，更是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中国和日本的学者认为，这是指日本列岛。但是不少欧美的学者提出，这里所说的倭和扶桑是指今天的墨西哥（纽曼）或者美洲海岸（德·基努）。中国学者梁永湘则认为，它是指今天的洛杉矶和墨西哥之间的海岸。不过，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是从古代地理的基本状况来看，这里所说的“倭”应该是日本列岛。详细讨论情况可见壹岐一郎的《日本，关于扶桑说》，参见王金林、汤重南：《走向国际化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区域，结果在公元前 2 世纪时，汉王朝在朝鲜半岛上设立乐浪及带方等四郡，文化融会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与此不同，日本列岛有海峡作为屏障，没有出现文化的直接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文化的主体性[①]。

这种地缘条件使日本列岛在接受中原文化传播时具备了自身的特征。一方面，它可以避免直接的文化冲击；另一方面，当列岛产生需要时，又可以主动地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这种状况实际上构成了古代日本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来看，截至到公元前 2 世纪，虽然中原地区的文化扩展运动不断加强，但列岛上的文化发展基本上局限在自身的范围内，此后，列岛上出现自绳纹文化至弥生文化之间的断裂。许多研究者曾经指出，这大约是大陆文化比较大规模涌入造成的结果，可能意味着它是大陆中原文化的冲击和渗透的产物。不过，尽管如此，大陆中原与列岛的交流依然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与朝鲜半岛建立四郡的情况相比大相径庭。

自这一时期到 7 世纪，日本列岛一方面接受东亚文化中心扩展而来的影响，一方面完成自身的文化发展进程。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列岛上诸氏族之间的交流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统一趋向。这种文化发展的情况，虽然较中原地区向大一统的发展进程迟缓了一段时间，但其从部族走向统一的趋势十分类同。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前后，世界范围内承继下来的其他文明区域，也都大体在经历同样的过程。欧洲文明中出现的罗马帝国在时间上相差无几，其统一趋势也大体类同。仅就东亚文明的

① 13 世纪，元朝统治者占领中原地区以后，曾经于 1274 年和 1281 年两次率船队迫近日本列岛，但元军只习于马上作战，不习水性，更兼遭遇台风，结果均告失败。除此之外，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在古代很少发生过大规模的直接冲突。

中心地区而言，经历了公元前 2 世纪之前的部族统一，出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在短暂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后，又建立了统一的强盛帝国唐王朝。由部族并立走向一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类型。日本列岛与此基本同步，从“倭”分为百余国而逐渐走向大王朝廷的建立，经历了 645 年的大化改新，初步形成了统一王朝的格局。

不过，在这一时期，古代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一方面表现出走向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各个邻近区域之间的文化接触与融合，超越部族和民族的界限，相邻地区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例如，考古学的发现说明不同形状和材质的铜器——铜铎和铜剑曾经分布在列岛的不同地区，形成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近年来研究的结果表明，直到 3 世纪时，“倭”国的王权实质上仍是一个松散的军事政治联盟。它一方面和中原地区的魏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和朝鲜半岛上管辖下的一些部族政权存在密切的交流。

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从东亚文明的区域框架加以观察，在这一段时期，东晋、百济和倭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关系，而与此同时，前燕、前秦和高句丽、新罗又形成另一个强大的集团。更进一步上溯，人们可以发现在此前一段时期，九州岛上的一些部族与朝鲜半岛上的加耶、狗耶等地也曾构成经济政治联盟。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在古代东亚文明的框架下，列岛本身一方面在经历走向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又与邻近区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一时代呈现出来的文化交流表现出一种地区间密切联系的特征，构成一个部族集团林立而逐渐趋向统一的格局。似乎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个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形成的部族集团的活动与势力所及范围有限，它们虽然位于列岛，却更着重于与自己邻近

的大陆或半岛的地区开展联系和交流。更进一层次的交流有待扩大范围，而它则孕育着新的文化交流的方式。

第四，文明中心不断向周边扩展，甚至出现了文明中心之间的局部交流。

7 世纪以后，世界各地文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各大文明区域间开始出现接触，而在文明区域之中，周边文化出现了积极摄取中心地区文化的动向。日本文化在东亚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交流的背景下，在东亚文明的框架中开始呈现出古代贵族文化成熟的趋势。

从 7 世纪以后一直到 11 世纪，日本列岛在东亚文明中的相对地位及其运动过程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这种新动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列岛上的部族集团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成为主要的课题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岛上征伐不断，较大部族集团日益扩展其势力范围，逐渐形成一个踞于诸部族之上而且势力波及列岛主要地区的王朝。根据《日本书纪》记载，这一时期大和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神武天皇曾经发动“东征”，其后又曾经亲征“熊袭”。这些记载其实都是有关列岛部族集团相互征战兼并的反映。它说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各部族集团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列岛上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征伐，日本列岛逐渐走向统一。

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列岛本身的统一，势力强盛的集团更加注意汲取中原地区的发达文化。从列岛的形势来看，较强的部族集团开始主动地从中原地区的王朝汲取发达文化，用以武装自身，促使文化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又可以利用中原王朝的发达文化和强大势力作为背景，在与其他部族集团的征伐中占据优势。5 世纪以后形成的大王朝廷逐渐增强了从

中原地区汲取文化的意识，以至后来在圣德太子掌握政权以后，大王朝廷主动派出使节前往业已统一的隋王朝，汲取“西来”文化，以后又先后 10 余次派出遣唐使，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络绎奔赴中原，在官制、经济管理方式、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生产工具等多个方面积极摄取当时东亚文明中心唐王朝的发达文化。从 7 世纪至 9 世纪末，在 200 余年间，处于东亚文明边缘的日本列岛积极主动地摄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推动了自身的文化飞跃，建立起古代贵族文化，形成了列岛统一王朝统治的格局，构成古代日本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

如果从东亚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到 7 世纪以后,中原地区在统一的唐王朝统治下，生产力水平有了飞速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文化影响的距离明显加大，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上述日本列岛积极主动汲取唐代文化的历史事实表明，东亚文明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在范围上已经空前扩大。

同时，超越东亚文明区域，中原的唐王朝还与其他文明开始发生关系。中原地区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后，9 世纪初期，成熟灿烂的东亚文明中心区域的文化形成了它与“外国智识线相接触”的一次高潮[①]。这一时期的唐王朝成为 8 世纪前后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中土的广州、洛阳、扬州、长安都成为外国人荟萃云集的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僧侣、乐舞师来往络绎不绝。一方面，唐王朝的文化向外传播，除了影响东亚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区以外，还远及欧洲及中东，与欧洲文明发生交流；另一方面，随着东亚文明的成熟，更加大量地吸收其他文明的营养，导致东亚文明本身进一步的发展。其最典型

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8~9 页，中国书店，19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代表则是唐王朝广泛摄取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中原王朝不满足于汉代传入的佛教，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进一步的文化交流。唐代高僧玄奘西游求取真经，远涉南亚次大陆，游历“天竺”,访僧求学,后携 600 余部佛经回归中土。其后，佛教哲学对东亚文明区域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还促成了儒学在后来的新发展。至于佛教导致的绘画及文学的兴盛与发展，也自然促成东亚文明走向新的阶段。此外，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也曾在这一时期渗入东亚文明圈，丰富了东亚文明的内涵。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文明区域之间已经出现局部交流的现象。

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处在东亚文明与南亚和欧洲文明发生交流的背景下。位于东亚文明东方边缘地带，日本不仅摄取中原东方文明，而且汲取了经由中原传来的佛教文化及其他要素，促成了日本古代文化的成熟。后来，随着东亚文明总体格局发生变化，当唐王朝走向衰落时，日本列岛于 9 世纪末决定不再派出遣唐使。这标志着列岛对于东方文明中心的向心文化运动告一段落，转而在东方文明的框架下致力于反刍消化，走向新的形态。

总体说来，截至 12 世纪止，日本文化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在东亚文明框架之中汲取中原文化的过程。它一方面显示出东亚文明区域内日本文化的飞跃与发展，另一方面又培育古代日本文化——主要表现为古代贵族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当日本古代文化基本上接近于东亚文明中心的发达水平而趋向成熟时，列岛又开始转而致力于咀嚼它已经汲取的发达文化，进入新的时期。

从 13 世纪至 17 世纪初期，日本文化经历了最为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正如世界各地文化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一样，日

本列岛在大规模移植唐王朝文化，建立成熟的古代文化以后，其内部的生产力发展推动文化向更高层次迈进。这一时期，一般称之为中世时期，而中世文化的发展依然处于东亚文明的框架之中。一方面，它源自古代文明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始终同中原文明中心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中世时期日本列岛出现战乱，实际上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正是促成日本民族文化生成的重要条件，奠定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至于 17 世纪以后，日本文化更是处于东亚文明的框架之中，把吸收和改造中国儒学作为重要意识形态。日本还依照中国文化的“华夷观念”观察外部世界，形成了自身的国际政治战略思想，并始终意识到它自身是东亚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在 17 世纪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文化如同东亚文明地区的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开始生长出近代文化的萌芽。日本知识界中，一部分人开始将儒学改造为经验论的依据，出现了走向近代文化的先兆；一部分人更积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发展，扬弃古代儒学，试图用以“经世济民”，探索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还有一部分人则积极摄取欧洲文化，成为其后日本近代文化发展的思想先驱。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日本文化作为东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现出东亚文明的成熟，为其后近代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文化经历了继承东亚文明和走向世界范围文明的全新历史发展过程。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和 1945 年以后深刻的社会变革，给日本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日本目前正在经历更加深刻的变革。

现在，在我们鸟瞰古代日本文化与东亚文明的关系之后，逐一剖析日本文化在东亚文明背景下的发展进程。

第一章　文明边缘上的飞跃

一、文明的曙光

—— 水稻从天而降

在亚洲东方的列岛上，日本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飞跃与停滞、兴盛与衰退等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而在 2000 多年前，大约公元前 3 世纪时，日本列岛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文化飞跃。这主要表现为它接受中国大陆的水稻耕作技术，脱离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而迎来文明的曙光。虽然由于历史久远而难以作出详细的考察，然而日本的古代神话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线索。剥开它神秘的外衣，可以发现不少水稻耕作技术自中国传入日本列岛这一历史事实的迹象。

日本神话认为，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它的历史始于“天孙降临”。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在高天原诸神中，天照大神为日神，是天祖。他与速须佐之男命立誓各自生子。于是，“速须佐之男命取天照大神缠在左髻上的美丽的八坂勾玉的串饰，琅琅地响着，在天之真名井里振涤，戛戛地咬了，从喷出去的雾气里生出的神名正胜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

命”——是为天之子①。后来苇原的中国平定，天照大神令子下临国土时，天之子恰生一子，名曰番能迩迩艺命，此即天孙，天照大神授令番能迩迩艺命曰：“苇原的中国是你该统治的地方……可即从天而降。”② 于是，“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迩艺命乃离开天的座位，分开丛云，威势堂堂地走来，从天之浮桥上，下到浮州，站在上边，遂降至筑紫日向的高千穗灵峰上”③，居住在“苇原的千秋万岁的水穗之国”。这样，天孙降临于荒凉的不毛之地，为日本民族祖先，“遂于岩石立壮大的宫柱，栋梁直耸入云霄的宫殿”④ 繁衍不断，又生子曰穗穗手见命等各神，即成其后之诸民。

这个“天孙降临”的神话似乎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却可从中窥见几点发人深思之处。

首先，神话中的天孙名曰“番能迩迩艺命”。据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考证，依据古代日语发音规则，它应读作“HON-ONINIGI”，本意为“穗饶”。其他诸神名称，如天之子曰“天忍穗耳命”，天孙之子则直呼为“穗穗手见命”，均以“穗”为命名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次，天孙降临的土地是“水穗之国”，虽然曾是不毛的“空地”，但却名为“高千穗”之灵峰⑤。它告诉人们，始祖携“穗”自天而降，居住之地由不毛荒野而变为“水稻”和“千穗”之国。据日本文字学考证，“穗”者，古解“稻”也。由此可见，依据神话寓意，人们可以理解为水稻来自“天国”，是神的赐予，降于稻名之国，原

① 太安万侣著，周启明译：《古事记》，1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② 太安万侣著，周启明译：《古事记》，38 页。
③ 太安万侣著，周启明译：《古事记》，39 页。
④太安万侣著，周启明译：《古事记》， 40 页。
⑤根据《古事记》记载，“水穗之国”是天照大神之子天忍穗耳命统治的国土。“水穗之国”意谓因农业而繁荣的地方。参见《古事记》 32 页。

有不毛之地遂成水稻之乡。它告诉人们，水稻非本土所生，而是来自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

第二，那么水稻来自何方呢？综神话所述，它来自“天国”。这天国名为高天原之国，是日本民族祖先的神国。在这神国的土地之上，曾经争战不息，曾有婚孕繁衍，也有谷稻丰饶。总之，那是一个“文化发达”的诸神之国。许多传说与习俗也说明，这个“诸神之国”在海之彼端。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人们自水中登陆的祭礼习俗，不少传说叙述先人渡水而来的经历。这些都暗示，部分祖先曾渡水由海上登临列岛。两者联系起来看，这个“神国”似在海之彼岸，是祖先迁徙而来之前的居地。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地理环境，联系中国大陆当时历经“小国”争战的情形，可以想见，中国大陆很可能就是这个“文化发达”而又“诸神争战不息”的“神国”的缩影。水稻正是从这个“神国”的中国大陆渡海而来，从“天”而降的。

神话分析自然有待进一步考察，但综合起来看，水稻源自中国大陆，随人流迁徙而传至日本的痕迹，却可以从上述神话中得出某种程度的佐证。

考古资料还进一步说明，日本列岛水稻耕作是中国大陆文化东渐的结果。根据考古发掘，北九州福冈岩崎遗址曾发现烧焦的水稻炭块，它附近的竹下遗址也曾有烧焦的水稻炭块与弥生陶器一起出土。此外，还有多处弥生文化遗址都曾发现出土的陶器的壁上粘有稻茎和稻壳的印痕。这些遗址的地理位置大体说明了水稻自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由西东渐传播的基本情况。此外，九州地区弥生文化早期的石器农具和墓葬形式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有极为相似之处，说明了日本列岛水稻与中国大陆水稻的亲缘关系。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大陆

战国时期北方燕国势力东渐，流民迁徙东向，结果水稻逐渐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北九州地区。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考证指出，汉武帝于公元前 108 年在朝鲜半岛设立乐浪四郡，由于这股中原势力先前已开始东渐，中国大陆文化早已涌入朝鲜半岛并逐渐南进，水稻也就同时传至日本。考古资料说明，诸如支墓石、瓮棺的葬法与朝鲜半岛南部初期农耕时的墓葬方式相同，九州地区葬墓殉葬物铜器源自中国大陆。这些材料也都可以使人们窥见水稻自中国大陆东传日本轮廓之一斑①。

迄今为止，水稻自中国大陆传至日本的途径，限于资料所限，众说纷纭。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水稻自中国中原地区途经华北和朝鲜半岛而传至九州；二是认为水稻自中国东渡大海，直接传入北九州；三是认为中国中原水稻经华南传入日本南部各岛，沿岛屿北上而达九州地区。此外，还有些学者更提出南北同时传入的观点。由于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再加上资料匮乏，至今未有定论。但是有一点则是大家一致的：日本的水稻耕作是中国文化东渐传入的结果，这是公认的事实。

考古发掘和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水稻种植是古代中国文化东传的直接结果之一。从时间上看，在水稻于公元前后传入日本之前，在距今 6000 年前的中国仰韶彩陶残片上，曾经发现谷壳印痕，经学者研究认定它是人工种植的稻米外壳。文献也

①关于水稻自中国传入日本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有所谓北路说和南路说等不同意见。前者认为，水稻发源于中国中原地区，从北路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后者认为主要是通过中国南方经过海上传入日本列岛。近年来，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日本学者梅原猛提出，水稻始于公元前 3000 年前后中国的云南地区，后来于公元前 1000 年前后传至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公元前 300 年前后传入日本列岛。参见梅原猛等编著：《东洋思想的智慧》，14～15 页，日本 PHP 研究所，19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